

# 孙中山容闳教育思想比较

李西军

孙中山与容闳这两位广东香山老乡,都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著名人物。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容闳则是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中国留学制度的创始人。他们都极为关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都重视教育、人才在救国和强国中的作用,并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观,尤其在教育与国家间的关系上都有独到的见解。总体来说,孙中山与容闳的教育观既有从同之处,又有创新之点。

## 一、以爱国为支点的道德教育观

孙中山和容闳把爱国教育置于道德教育的核心位置,视爱国为教育目的之基础。因为他们自身都是非常爱国的,所以,他们在革命和教育实践中,无时不把爱国教育提到教育的首要位置,注重加强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孙中山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始终把爱国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他说:“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国事。”<sup>〔1〕</sup>他对祖国有着真挚的爱与深厚的感情,在其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强调爱国是每个国民立身的基本出发点,把爱国主义放在教育的突出地位。要求青年一代不仅要爱国家,而且要爱人民。“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sup>〔2〕</sup>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唤醒国民,为国服务”,不惜断头流血,牺牲生命。青年学生“应该学他们的志气,更加扩充,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sup>〔3〕</sup>。近代中国正面临着“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瓜分豆剖”<sup>〔4〕</sup>的严峻局面,

“外人迭生苛例，闭门拒我！以吾人为亡国人，亡国人世界无位置也”<sup>[5]</sup>。因而，青年学生应“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sup>[6]</sup>。同时，他指出，爱国要有正确的道德观念，“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我们在民国之内……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人民。……为四万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sup>[7]</sup>。对于生活学习于国外的留学生们，孙中山更希望他们“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sup>[8]</sup>。当以“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作为求学方针，而不应“为一己攘利权”<sup>[9]</sup>。这样才能“让将来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sup>[10]</sup>。可见，孙中山教育观的核心是要摒弃陈旧的“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的教育目的，新的教育目标应当是培养“报效于国家”的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型人才，培养有“报国大志”和“献身精神”的有用人才。这些人才应当“替众人来服务”，“为社会服务”，“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sup>[11]</sup>。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人要有“献身精神”与“牺牲精神”，才能去改造旧中国，“建造新的中华民国”。

对于容闳而言，爱国是他一生教育思想的主旋律。虽在国外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sup>[12]</sup>。早在他于留学期间陷入经济困境时，他就拒绝了孟松学校校董会以回华充当传教士为条件的奖学金。他明确表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sup>[13]</sup>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在容闳的心目中，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sup>[14]</sup>。他表示：“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也不管人生的浮沉盛衰，我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不渝。”<sup>[15]</sup>为实现自己的报国梦想，容闳毅然放弃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回到祖国，四处游说，以实现自己派遣留学生的救国计划。他在担任肄业局委员之时，处处把爱国理念融会在学生们学习和生活之中，立志要培养出一批爱国人才。在他制定的留学生计划之中，学生在留学期间不仅要学习英文，还要在

汉文教师的陪同下兼习汉文,以不忘国家的语言。容闳坦言,留学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储备人才,以实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16]</sup>。在他援助一位幼童留美完成学业时,就要求这个学生答应毕业之后必须供职于中国政府。在其影响之下,幼童们个个都树立了爱国、兴国的学习目标,没有一人被西化,更没有一人成为守旧人士所说的“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sup>[17]</sup>。相反,全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知名人士,还出现了唐绍仪、詹天佑这些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极具影响力的著名人士。容闳自己和他的幼童们的杰出表现充分展示了他的爱国主义教育观,这对中国以后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教育观的改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诚如特韦契耳牧师评论道:“他从头到脚,身上每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sup>[18]</sup>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可见,在孙中山和容闳的教育思想之中,爱国主义教育教育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国内的学子,还是国外的留学生,他们都希望学生们都能够以国家的兴旺和昌盛为己任,能够担负起救国、富国的重大责任。在当时中国遭受列强欺辱、政府无力解救的情况下,青年学生必然要担负着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前提所在。所以,在教育学生爱国和承担振兴国家的重任方面,孙中山和容闳的教育观中有很多相同之处。

但孙中山的爱国思想和容闳的爱国教育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容闳的爱国教育思想中,他没有清楚地把政府和国家及人民、爱国与爱人民分别开来。只是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为国家服务,而这个国家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当时的清政府。因为留美幼童是官派留学生,他们当初的留学目的便在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sup>[19]</sup>。及至留学生们归国之后,大多都服务于当时的政府部门,只有极少数人投身于革命之中。所以说,容闳没有把救国和救民结合起来,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这显然与容闳所处的环境和所担任的官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孙中山则自始至终都把“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替

众人来服务”作为爱国的集中体现,强调这里的爱国对象是爱人民和爱社会,超越了模糊的国家概念。他反对盲目的爱国,强调不仅有爱国的情感,更要把这种情感转化为责任。爱国就是要救国,教育不能脱离政治,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应关注政治,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把国家变富强”。“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sup>[20]</sup>而要“问国事”,就要“明白三民主义和实行三民主义”,这是大家“对于国家应该负的责任”<sup>[21]</sup>。他明确指出,学校要把学生培养成对革命和建设有用的人,要把爱国教育和民主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既是孙中山对教育培养目标的殷切期待,也是对青年学生道德品格的明确要求。这些显然超越了容闳的爱国思想,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更为深刻的内容。

## 二、教育乃立国之本与教育救国

教育与国家兴亡间的关系也是孙中山和容闳教育观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都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关键所在,发展教育是开发民智、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孙中山认为教育乃立国之本,容闳则提倡教育救国。

孙中山把发展教育提高到“国本”、“国脉”的高度来认识,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sup>[22]</sup>。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指出:“远观历代,横览九州,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糜,实关教他(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返(反)此。”<sup>[23]</sup>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又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只有“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国家才能化贫为富,转弱为强。“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sup>[24]</sup>他再三强调:“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sup>[25]</sup>中国若想自强,必须先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诚以治国经邦,人才为急”<sup>[26]</sup>。为此,他要求中国政府“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sup>[27]</sup>,以期通过学校教育,使“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sup>[28]</sup>。他还一再强调,今日要恢复人格,“第一件须从教

育始”<sup>[29]</sup>，“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sup>[30]</sup>。“凡国强弱，以学生程度为差”<sup>[31]</sup>。可见，孙中山科教兴国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他把发展教育视为“振兴中华”、建设“共和新国”的长远大计，是挽救中国危亡的“富强之经、治国之本”<sup>[32]</sup>。但同时，他又指出，“教育进步，以政治为基础”，“政治不良，教育不能发展”<sup>[33]</sup>。政治与教育的发展应该是息息相关的。为了贯彻他的教育观念，在任临时大总统之时，他颁布一系列政令提倡开办学校，普及国民教育、重视女子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等，把教育置于国家事务中的首要位置。他在给教育部的命令中再次重申了教育的重要性，“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sup>[34]</sup>。“只有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才能最终完成国家富强的事业。”<sup>[35]</sup>

容闳则是最早提出教育救国思想的人，也是近代教育救国论最有成效的实干家。早在留学期间，他就树立了“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sup>[36]</sup>的远大理想。希望“藉西方之文明，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sup>[37]</sup>。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而西学则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途径。他通过自己受教育前后的对照，深刻地认识到，可以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修养，培养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以此来改造国民性，达到救国之目的。容闳认为，教育可以“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格，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sup>[38]</sup>。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使他们不甘屈辱，勇于反抗外来压迫和侮辱，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和自尊。他指出：“自从上海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借地之后，在其管辖区内从未听说过任何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侮辱时，敢于毫不畏缩地挺身保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骄傲和专横。”“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sup>[39]</sup>此外，为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容闳还以西方教育为模式提出了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机械、铁路等实业教育以及女子教育等等，体现了他对当时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也体现出了他希望借

助新式教育,塑造全民健康人格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伟大愿望。这些不仅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对当今社会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由此观之,孙中山和容闳都非常重视教育在振兴国家、富强国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都大力倡导教育,主张发展全民教育、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等,并为此四处奔走宣传,目的都在于希望提高国民素质,实现救国、富国的梦想。但容闳所提出的教育救国论着重于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进因素,以改造陈旧的中国文化,由此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着重于从救国的角度和途径上提倡发展教育,当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而孙中山却对于教育和国家救亡的关系上能站得更高,理解得更深,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清醒地认识到了教育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把教育视为建设国家的重中之重,而救国的关键还在于通过革命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是容闳所无法比拟的。

孙中山对教育救国论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有人说,教育是立国的要素,但我们要致力于教育事业,一般官吏,非特不能提倡,且将设法摧残。假使我们培养一个青年,费巨额金钱,俾受一种完全教育,官吏有时竟因疾视新人物的心理置诸死地。”<sup>[40]</sup>那么改造中国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呢?“只有革命”<sup>[41]</sup>。所以,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希望通过教育改造国民的品格,重塑国民精神,提高人民的觉悟,进而改变腐朽制度。只有全体国民“皆有受教育的权利”,提高科学文化程度,民族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富强。孙中山主张通过内部发展教育来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他大声疾呼:“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罢(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sup>[42]</sup>这种教育观念是全面的,其深度和力度远远超出了以西式教育来救国的方法,显示出了一个革命先驱者高瞻远瞩的眼光!

另外,就发展女子教育而言,容闳主张的女子教育只是基于提高子女“智商”,由此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如果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胎教’开始。”“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sup>[43]</sup>。而孙中山提倡的普及女子教育则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将妇女解放运动看成是中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国”<sup>[44]</sup>。他将爱国主义和道德教育与民主革命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其意义当然不同。此外,孙中山还能够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倡儿童教育和民族教育,目的也都在于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富民强,这些也远非容闳的教育救国论所能相提并论的。

总之,孙中山和容闳这两位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在不同的时期,都对教育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不同的阐述。当然,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处的立场相异,他们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渴望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达到救国、强国之目的,并身体力行去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这对后来的教育现代化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教育史册!

####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3—554页。

[2]《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

[3]《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6页。

[4]《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5]同上,第523页。

[6]《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7页。

[7]《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0页。

[8]《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2页。

[9]《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3页。

[10]《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页。

[11]《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4页。

[12]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自序。

[13]同上,第60页。

[14]同上,自序。

[15]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16]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 [17]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页。
- [18]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 [19]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 [20]《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542页。
- [21]《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
- [22]转引秦孝仪:《国父学说思想精义录》,第429页。
- [23]《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 [24]同上,第8—10页。
- [25]《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 [26]《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 [27]同上,第2页。
- [28]同上,第3页。
- [29]《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8页。
- [30]同上,第423页。
- [31]同上,第360页。
- [32]同上,第253页。
- [33]《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5—566页。
- [34]《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页。
- [35]《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
- [36]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 [37]同上,第67页。
- [38]同上,第28页。
- [39]同上,第43页。
- [40]《孙中山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 [41]同上,第423页。
- [42]《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 [43]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湾:传记文学,1979年版,第99页。
- [44]《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8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